



TITLE:

"學術與地域、國家和社會的關係" 讨论意見

AUTHOR(S):

杨, 菁华

CITATION:

杨, 菁华. "學術與地域、國家和社會的關係" 讨论意見. 2015年度京都大学南京大学社会学人類学若手ワークショップ 東アジア若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ワークショップ報告論文集 2016: 201-202

ISSUE DATE:

2016-06-04

URL:

<http://hdl.handle.net/2433/215770>

RIGHT:

讨论意见

杨 菁华 (YANG Jinghua) *

1. 研究者如何逾越 20 世纪的框架——地域与人

纵观世界历史，两次世界大战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格局。二战后，东亚各国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和调整，新的民族——国家形成以及战争所留下的历史记忆都使得各国之间难以就相关的历史议题达成一致的共识。长久以来，中国的历史都是由掌握文字的精英所书写的，来自底层的“个人”的声音常常被忽略。这样的景况直至今日亦尚未发生较大的改变。中山同学在讨论文中所说的研究者在促成东亚形成一致的历史共识过程中应当发挥自身的作用，因而需要突破原有的以国家——民族为主语的讨论更多地关注地域与人。无疑，这样的想法对既定的研究范式而言是颇具创见的。当宏大的以“国家——民族”为主语的历史书写转变为以“地域——个人”为主体时，诸多的历史事件将呈现出更为多元的面貌。将国家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从研究及书写当中抽离之后，得到的也许是更纯粹而有温度的研究。对于真实的追求以及对“人”的关怀始终是社会人文科学的题中之义，同时亦是它独特的价值所在。

然而，在我看来，对于 20 世纪研究框架的逾越无法一蹴而就。一方面在于原有的“国家——民族”范式强有力的话语权力对“地域与人”的研究及表述的影响。任何一种研究范式的形成及持续都具有惯性作用，旧有范式无法在朝夕之间被颠覆，新范式的形成亦同样不是在转瞬之间就能完成。譬如，就我在中国国内看到的情况而言，目前民族学人类学界内的许多研究仍然是以国家政治所划分的“民族”为界限进行研究，在部分高校内亦有研究中心直接以某族的名称命名。这样的境况既是由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现实所催生的，也是由长期以来民族学研究多是由政府出资而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虽然近年来在学术界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以区域社会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研究，但以族别为界的历史文化研究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存在着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的民族国家如何逾越原有的研究框架促成东亚共同的历史认识的形成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地思考与讨论。再者，中山同学所说的以“地域与人”为主体的研究是否是我们应当抛开“国家——民族”给我们思维及研究所带来的桎梏，更多地回归到某一地域内的个人所具有的历史体验上？如果是的话，我认为在进行这样的“地域与人”的研究时需要注意每一个表述自己体验的个体所具有的不同阶层、不同认同及不同身份等社会属性。因为同样的历史事件对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与空间中的个体而言，其所带来的体验迥然而异。并且每个人在表述时的动机不一，如何保证个体的表述是真实而中肯的，这一问题也需要注意。

2. 人文社會科學的最大支援者是不是國家？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特殊的学科属性与能够立竿见影地产生实际产品和效益的理工类及应用型学科不同，因此“急功近利”的政府和国家对其的重视程度也远远低于这些能够直接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应用学科。日本政府在 2015 年要求各高校取消或转型人文社会学科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引发了世界舆论的热议，诸多的媒体都认为人文社会学科是孕育批判

* 南京大学、博士在读、社会人类学。

精神的摇篮，取消这些学科的设置会有助长极权出现的风险。毋庸置疑，如此武断地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对国家的贡献不大，没有必要进行支援的观点是狭隘而短视的。

人文社会学科对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无论是在东亚还是世界各国各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多设置在高校内部，目前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由国家主办，因此政府下拨经费及国家设置的各种社科基金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但在当今全球化与市场经济体系急速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人文社会学科也以越来越“入世”的态度参与其中，跨国公司及财团也因为自身发展需要设置了各式研究项目可供申请。虽然独立于高校之外的研究机构仍然不是主流，但部分具有前瞻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学人运用自己的智慧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并进一步推动着学科的发展壮大。在中国，我所了解到的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经世致用”的例子有原北大社会学专业毕业的袁岳先生，他不仅开办了零点调查公司为各大企业的社会调查及项目研究服务，还利用自己的极佳口才在中央电视台开办了名为头脑风暴的电视节目。由此看来，只要学人发挥自身独特的学科优势以积极入世的态度融入社会和市场并在其中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学科最大的支援者也未必只有国家。

另外，在研究者与国家的关系这一议题上，我想说的是，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存在着作为国家、政府的鼓吹手的“政治学者”同时也存在着时刻警醒坚持道义与良知“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披露真实的有担当有脊梁的真正学者。能够“一针见血”地直指政府弊端的学者不在少数，但能在指出政府弊端的同时真正影响政府做出改变的学者却凤毛麟角。作为年轻的研究者我们当然不可“为五斗米折腰”做国家和政府的宣传鼓手，但一味激进地咒骂同样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我想，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研究的可操作性，在理性地陈述问题、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真正能够被政府采纳、实践的解决方案。只有用实际的研究成果证明学科的应用性在不断增强，我们的学科影响力才能够不断扩张。

3. 與市民社會應怎樣溝通？

中山同学在讨论文中强调了“市民”不是指等待领导者来领导或知识分子来启蒙的民众，而是指认识到自己的义务及权利并主动进行发言和行动的个人。日本的“市民社会”程度或体系相较中国而言要成熟许多，中国的公民当中能够真正被称为“市民”的数量恐怕为数不多。因此，我个人认为学术研究与人的沟通问题与其只针对已经觉醒的“市民社会”不如直面平凡的普罗大众。毕竟，“市民”的数量要远远少于普罗大众。我们既要保持自身学术视野的高度，也要从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入手多做“接地气”的学术研究，让学术成果不仅能经得住学术界内严谨的规范考验同时也能被普罗大众明白、接受。美国人类学家米德就是表现突出的极佳典范之一，她不仅研究著述等身，还积极地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开设专栏，写作的内容涉及到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因为这样的积极“发声”使得她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极富影响力，也成为印制在美国邮票上的人类学家。当我们的学术研究被广大的群众所接受并产生影响力之后，自然会形成自下而上的推力被国家和政府所认可，从而也为学术研究和形式的拓展赢得更多的空间。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还望诸位多多包涵！